

狮城脉搏 王昌伟

## 请开放官方数据与档案

副总理尚达曼在胜选后对在野党、公民社会组织和网络媒体表现出让人欣慰的开放态度。他认为，在野党、公民社会和媒体必须在新加坡扮演更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他也鼓励在野党一些表现亮眼的新面孔坚持下去，不要因为败选而放弃。

不过，要让所有政党和组织能真正扮演好它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能只是在言语上或者态度上进行肯定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有实际的行动，确保这些政党和组织能够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经济师杨南强近日在其面簿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贴文。文中提到政党竞争中对在野党不完全公平的现实，但我更为关注的，是杨先生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难道真的需要垄断一切官方资讯和数据，造成在少数身份不明的专家之外，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提出替代政策或进行相关辩论的结果？

要求在野党或者公民社会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我们就必须确保任何的资讯和数据的流通都是透明的。研究新加坡历史的同行告诉我，许多的政府记录都是不向公众开放的，因此要进行研究十分困难，只能依靠国外的档案和其他的材料，来试图建构历史叙述。

去年工人党议员刘程强曾经在国会里呼吁政府，跟随英国等国家的做法，制定类似“30年条例”的文件解密条例，陆续公开一些属于机密文件

的官方档案与内阁会议文件，可是却被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应该为了展示透明而透明化，因为这会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

时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的黄循财说：“你若观察其他国家的做法，会发现制定自由信息法或公开文件的条例时，一旦不小心，不但无法改善政府治理，反而可能无意间导致信息变得更不透明。档案会出现缺漏，一些政策文件或内阁会议文件中的记录与细节也不全。”

他也认为：“有些国家在执行信息自由法时‘过了火’，公开机密文件可能反而对治理有负面影响，因为公务员一旦知道政策文件日后将公开，可能会选择刻意不记录一些细节，甚至隐瞒实情。”

这样的回应让人感到诧异，因为一向对自己的高效率、诚信有十足自信政府，难道就不能避免“一旦不小心”的情况出现？难道就无法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公务员诚实？用这种程序上所可能出现的疏漏，来否定一个原则上的问题，难以让人信服。

在有关政策的制定和讨论中，官方所掌握的数据更是至关重要，缺少这一类数据，学者在进行政策研究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就会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例如2003年，当时在南大任职的两位经济学者，通过人力部的网上数据进行本地就业状况的研究，并得出在过去5年里，有高达四分

之三的新就业机会落入外地人手中。

研究报告一出炉，马上就招致时任人力部部长的黄永宏的严厉批评。据报章报道，当时黄永宏说：“针对这份南大报告，他们的数字错得太离谱，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获得这些数字，或者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后来这两位学者承认犯上了“诠释上的无心之过”，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数据和人力部所使用的、之前没有公布的行政记录中的数据并不一样，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黄永宏当时接受了他们的解释，这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不过显而易见，造成这场风波的关键在于，两位经济学家当时能够掌握的数据不够全面，造成他们无法对课题进行更有效和准确的分析。

非常可惜的是，那次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公众对于政府不公开官方数据是否合理的讨论。其实，在本地的学术界，这并不是孤例。我的许多从事本地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同事经常都抱怨，要向政府索取资料与数据进行研究，总是困难重重。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重新考虑他们目前对官方记录、资料和数据所采取的保密原则。如果政府能够正面看待在野党和公民社会参政议政的贡献，那开放官方档案、记录、数据，就是刻不容缓之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